

會理文史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6.12

01115107
会理文史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封面题字.....	杨 超
1950年会理马头会议.....	(1)
皎平渡旧话.....	(5)
1939年黄炎培先生给会理学生的一封信.....	(11)
泸沟桥事变后武汉日舰撤离经过.....	(15)
吴佩衡传略.....	(19)
刘子美先生及其遗作.....	(32)
会理地方教育历史简况.....	(38)
会理土布业的兴衰及产品的交换.....	(45)
从“听园春”到“逢春楼”.....	(50)

会理县马头会议概述

陈德明

一九五〇年初，我解放大军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蒋介石企图作垂死挣扎的最后据点——西康省宁属地区。三月初会理得到解放。但是，国民党军的残余势力，勾结地主武装四处骚乱，妄想死灰复燃。于是在五六月份相继在当时会理县境内的江舟（今会东属）、撒莲（今米易属）、小关河、太平场等地进行有组织的叛乱活动。隐藏下来的敌特分子，乘机散布谣言，扬言旧历八月十五要攻下会理城，以此来动摇民心，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有的窜入彝区，煽动、裹胁不明真相的彝族头人，参加叛乱，借此挑起民族矛盾，以便从中渔利。

为了保卫人民政权，一方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会理的一八四师五五〇团有计划地分赴各叛乱地区围剿叛匪。先后经过江舟战斗，小关河战斗、太平黑神庙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暴乱；另一方面，人民政府派出工作队，在解放军的配合下，深入彝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和团结各家支上层，使彝族地区的形势得到基本稳定，促进了剿匪任务的完成，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了使这一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推动民族地区的生产建设，五〇年十月，中共会理县临工委、县人民政府召开了会理县彝族地区各家支头人会

议，到会人员四十七人。通过学习、参观，使到会人员深受教育，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同敌特分子划清界限，协助政府肃清匪特，共同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民族地区生产。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和反复协商，于十月十一日共同制定通过了《会理县马头会议公约》（原文附后）。

《会理县马头会议公约》的制定与执行，不仅有力地打破了敌特分子企图挑起民族矛盾，进行反革命破坏的阴谋，而且使民族地区多年结下的冤家械斗基本停止下来，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使民族地区在以后的铲烟运动、民主改革等重大变革中能稳步前进，没有发生大的骚乱行为。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的一大成果。事隔三十余年，翻开会理历史，不能否认“会理县马头会议”及所通过的《公约》是会理历史上的重要一页。直到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四化建设，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以上仅仅是《会理县马头会议公约》制定前后会理情况的概貌，甚为粗略，请于补正。

现将《会理县马头会议公约》抄录于后（原件存会理档案馆），供《会理文史》作一参考，为研讨会理史实之士提供一点线索。

附：

《会理县马头会议公约》

一、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推行民族政策。

二、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切实友爱团结，不互相歧视压迫。

三、各民族之间及我少数民族内部，不得有互打冤家及一切欺骗敲诈、抢掠、烧杀等行为。

四、反对造谣恫吓人民的挑拨离间分子，肃清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残余匪特，保护交通治安。

五、凡发生纠纷应立即请人调解，各地头人，有主动援助调解的责任。

六、不掠人为奴，不侵占别人的土地。

七、提倡兴办学校，输送子弟读书。

八、提倡人人劳动，增加生产。

九、不听从匪特谣言，不参加土匪活动，不抢劫人民及打解放军。

十、说服教育彝族人民不种鸦片。

十一、如有挑拨离间的坏分子，逮捕归案。

十二、坚决不隐藏土匪特务，如发现者逮捕归案交人民政府。如不能逮捕者，可先行秘密报告政府，配合政府进行逮捕。

十三、不但自己不参加土匪活动，并说服制止自己的娃子及百姓不能参加活动。

以上十三条，经会议研究讨论，由全体会议通过后，坚决执行。

参加会议人员：

刘维和、付正学、付天明、王治清、云谷、禄德芝、
马成吉、普彩德、刘正品、王金华、木呷、卢有顺、
赫仕章、付正松、付海荣、刘波儿、刘德宣、马正文、
普长志、张志安、王金方、禄姑、何母土资、赫应学、
刘德发、付兴发、付正海、赫世文、赫应发、马正洪、
肖正品、王荣生、肖正卢、付荣恩、付正清、付正光、
刘成贵、力土日撒、赫世正、赫应理、何文举、付正朝、
彭开银、曾德正、何端正、付正荣。

公元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

（抄者注：原始名单中有二名付正松，已删去一名）

皎平渡旧话

严再洪

口述

陶鸣宽

记录整理

民国二十四年农历四月初，我帮助红军划船过皎平渡，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那时，我在渡口云南一侧的金家马店帮工——早晚打扫马店，白天划船，所以遇上了帮助红军渡金沙江的好事。

红军过完金沙江后，江上无船，交通断绝，马店不需雇人，我生活成了问题，才绕路来到四川这边的芭蕉种地，十二年后，又从芭蕉迁到富乐，仍然种地，直到如今。前年，我进七十岁，为了了却宿愿，我专程回到离别了四十二年的皎平渡去看了看。在那里，会见了周启龙、李文芳、陈月清、杨朝兴、张朝满等几位当年一同划红军过皎平渡的老朋友，虽说我们都已是老人了，可一说起旧话，大家却还象青年人一样兴奋。据他们讲，我们一同划船的，还有周德安、李明禄在世，其余的二十多人都早已离开人间，可惜没见到现时的好光景。不过，我觉得他们的在天之灵，也在叙旧，也象我们一样兴奋。

皎平渡两岸，曾是很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的江水相对说来较为平缓，且在洪水季节，当沿江数十里上下都已封江停渡时，那里却还照常摆渡，所以在川滇之间未通汽车、火

车之前，就成了两省交往的要道之一。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无论在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前还是以后，皎平渡的两岸都各有各的名称。渡口的云南一侧，当时属土司金利尧掌管，原本的地名叫拉嘎，因那里办过炼铜厂，又叫拉嘎厂，拉嘎是一种少数民族的语音，什么意思不清楚，只因金土司住在离渡口约二十里以外的皎平村，从云南到四川的客商一律要在皎平村交过税，付了船钱才能过江，拉嘎渡才被叫成皎平渡的。甚至有很多人把渡口叫做船房，似乎代表渡口的是皎平村，而渡口本身仅是管船的房屋而已。

皎平这地名，也几经变化才成了如今这两个字。我在金家马店帮工时，听附近的老年人讲，皎平村原来的名称已搞不清楚，退转去二百多年（到现在大概就是三百年左右了），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闹事，被清政府派兵剿平，才给那里起了个地名叫“剿平”，也有把它写成“绞平”或“搅平”的，这对住在那里的少数民族是一种侮辱，所以后来人们把它写成皎平，或因避讳“剿平”而另叫大村。

渡口的四川一侧，历来叫中武山，那时，中武山这名称比皎平、拉嘎都叫得响。

皎平渡举世闻名，大概是解放以后的事了。至于有人叫它绞车渡，显然是把皎平渡和皎平渡上游数十里外的鲁车渡叫混了。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红军来渡口之前，金土司的四兄弟金利海，妄图堵住红军不让过江，除把江上的船全部划到渡口上头的六转塘藏起来以外，还强迫他的佃户八十多人当团丁，在沙滩上天天操练，有的佃户因操练不合要求，连屁股

也给打烂了。可红军先头来到江边的人并不多，谁想那七、八十个团丁刚听到点风声，就连毡子、羊皮都顾不上，一窝风似的跑了个干干净净。

再说红军来到渡口的那天晚上，天刚黑，突然来了七、八个穿长条①的人，一来就把金家马店的杨店长和另一家客店的店长张朝连捆起②，当他们自报是红军，要杨店长和张店长把过江船交出来时，还悄悄上闹③我：“贼不得店长了，喊我大哥。”他怕红军晓得他是店长要吃亏。

那时，渡口两岸共有五支船，云南那边三支：一支渡客，一支渡马，另一支是小渔船；四川这边两支：一支渡客，一支渡马，五支船不够红军用——实际用的四支，小渔船很少渡人——他们把带来的很多木板，象铺楼面那样排开，又把带来的很多小布一撕两破当绳子，将木板扎成筏子，准备搭成浮桥过人马。但是，表面平缓的江水却流得很猛，筏子一再被冲走，浮桥搭不成。后来，红军去鲁车渡放了两支船下来，就不再搭浮桥了。

渡客的船载二十人，渡马的船载三十人，有人专门维持秩序，多一个人上船也不准。红军来到江边，有的就躺在江边的石缝缝里，样子都很疲乏，可是，一过了江，又都有了精神，他们下了船，并不休息，扭伸脚又走了。

我们三十六个划船的，分成两班，人歇船不歇，划了七天七夜才把红军渡完。当然有些迟来参加的船工并未划够七天七夜。

晚上划船，全靠两岸烧起的火堆照明，烧的是红军带来搭浮桥的木板。我们对着亮堂堂的火堆划，从不出错。各支船头，还点了个火筒，既照着红军上船下船，又标明了本船

的位置，以避免同别的船相撞。火筒是竹子做的，有两三尺长、两寸粗，当地没有这么粗的竹子，红军是早准备好带来的；筒子里装油，放一根比指姆还粗的灯心，大罐大罐的清油也是早准备好了带来的。

红军初来的时候，我确实有些怕他们。经过红军官长每天给我们讲话，说红军是来打富救贫的，将来还要分地给我们种，加上他们说话和气，对我们划船的照顾周到，未过多久，我也不再害怕了。红军对待我们船工确实很好，每天大米干饭随我们吃，还见天杀条大肥猪在马店摆起，专门犒劳我们划船的。这在当时，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那时，船工大多抽鸦片，红军也真想得到，还每天给我们划船的发鸦片烟。而且每天给我们发工钱。所以我们划船的三十六个人，几乎个个都越划越有劲。

别看我们划船的天天吃油大，红军在渡口两岸却是连稀饭也喝不上一口的。因为在江边等吃饭的人多了会堵塞渡口，而且经常煮饭，柴烟会引来中央军飞机的轰炸。于是当地人就做些吃的东西卖给红军。我老伴做凉粉卖。红军买凉粉不讲价，也顾不上要酌料，给了钱，拿起一块不需切细的凉粉边走边吃，忙着排队上船。一块不大的凉粉，一般都给五角钱。我老伴只几天功夫就卖得八十多元。红军给的大都是红军票④，红军过完江时，红军官长叫大家把红军票拿出来换现金票⑤，还告诉大家：“我们走了，你们拿着红军票就使不得了，都拿出来掉换，免得受损失。”那时我们划船的都说：“这样顾百姓的队伍，哪里去找！”

红军过完江后，船都划过四川这边，红军从岸上的洞子里丢手榴弹下来炸船，让船板全部顺水淌走。那小渔船把我

们云南那边来的船工送回去后，也炸烂顺水滴走了。

四川这边的江岸上，有一排山洞，那最长的穿洞⑥，是在红军过江前二十年左右挖的。通安有个财主康宝华，中武山是他的地盘。这里是陡岩，从前江水一涨，江边不能通行，客商和驮马就很难从陡岩上通过。康宝华为了过往客商在涨水季节不另寻渡口，并多收船钱和客店住宿费，才请人挖了这个穿洞。穿洞两头的那些依山洞子，则多是些盖不起房子的穷人自己挖来住家或做点小本生意求生活的。那江边的山岩，含硝很重，看是很硬，只要浇上水，凝结山岩的硝溶化了，挖起来却是不大费力的。

红军过江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穿洞便不准通行，原来穿洞里住进了一些红军官长，有的胡子已有几寸长了。我重回皎平渡时，才听说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都在山洞里住过，那胡子最长的，原来就是周总理。我还发现，穿洞以下的有些洞子，当时并不见有，那肯定是红军走了以后才新挖的。

红军同我们分手时，一再关照我们要躲避，说中央军随后就到，谨防吃亏。还说，他们要不了多久就回来，那时再来酬谢我们。

红军一走，我就躲到法几块⑦去了。

解放后，我分得了田地，生活逐渐好起来了，而今我是儿孙满堂，不缺吃穿，处处受尊敬。我给红军的帮助是那样小，红军给我的酬谢却是这样大，我实在感激不尽。

1978年5月11至14日记录

1978年5月25日整理完毕

注：

①长条：即长袍、长衫。

②箍起：控制起来的意思。

③上咐：求情、说好话的意思。

④红军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⑤现金票：当地流通的一种由云南省当局发行的纸币。

⑥穿洞：即隧道。

⑦法几块：皎平渡云南一侧所负大山顶上的地名。

1939年黄炎培先生给会理 学生的一封信

杨焱宗

1939年，黄炎培先生任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率南路组来宁属视察，于五月三十日来到会理。

会理是黄先生蜀南之行的最后一站，经过近一月的行程，在宁属所见所闻，均使他痛心疾首。特别对烟毒泛滥，虎狼当道，更是忧愤难抒。所以，每到一地，都把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曾向各县中、小学生进行多次演讲。在西昌为省中、省师、女中、县中九百多学生演讲中曾介绍郝陵川语：“能救百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则吾学为有用矣。”^①并鼓励、教导学生：“凡良心认为应做的必须做到；凡经口头说得必须行得。”夜宿锦川桥小学，曾和学生团坐月亮下面，大谈抗战意义。在摩挲营县立第八小学，又和住校小学生畅谈，向学生解答抗战问题、禁烟问题、汪精卫叛国问题等。到会理后，连续数日向会中、一小、二小、女小四个学校的学生演讲，以“人生修学全视图”为题，鼓励和启发学生，最后总结为：“知救国，知救民，才是有志气的青年；能救国，能救民，才是有本领的青年”。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若干问题，并从而得出结论：“从这许多问题中间，看出

中国文化的深厚，国民爱国心的浓挚而普遍，这样的边僻县分，简直和一般地方毫不两样。”

这是对会理的评价；也是对会理年轻一代的评价。

六月五日，黄先生离开会理，转道西路迷易步入归途。到达攀莲街后，被途中遇到的两位参加了抗日的小河小学的学生来信激动得“脑海里掀天撼地的热浪。”他不顾旅途疲劳，给会理的学生写了下面的这封信：

会理省中②、一小、二小、女小诸学友：

此次三度演讲，一度谈话，临行复承推举代表相送，彼此感情浓厚到极点了。诸君！你们是青年，我是中年以上之人，年龄相差这般大。我是江苏人，你们生在会理，彼此家乡相距又这般远，何以彼此感情会这样浓厚呢？就是为大家有一种相同的认识，认定我中华民族祖宗所手创、所遗传的，许多革命先烈用血和肉去换得来的锦绣般的河山，已被凶暴的敌人占去了一半，还在向我不断的进攻。诸君！我们怎能一刻忘掉已失各地的男女老幼同胞陷在暴敌势力之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呢？诸君？我们怎能一刻不想到，如果没法把敌人打退，不论前方后方，任何区域，男女老小同胞，都将和陷敌各地的同胞同样的吃苦呢！古人说：“覆巢之下无完卵”。诸君！我是中年以上的人了，你们年纪这样青，前程何等的伟大，所负的责任，何等艰巨！如果对于抗战，对于建国，大家努力去干，诸君的前途，真是了不得。若是不努力的话，诸君的前途，简直是不得了。我虽是中年以上，既经看到这里，不但应该负起同样的责任，并且应该把我所有的一些些的知识和经验，尽量的传给一般后辈青年。所以东奔西走，到处和各地青年做朋友，而各地青年，也就很诚

愿肯听取我口头的讲话，或接受我书面的表示，大家把一颗鲜红的心，互相交换。诸君！怕你们也就承认我所讲的一番道理吧！

我已和诸君分别了。但是，我还有几句话要贡献给诸君，并且又有新资料要贡献给诸君。我们同来的李璜先生说：“我们中国人打仗打聪明了。”这句话真好。诸君！今后我们做人的标准提高了。我们老一辈的做人，在当时也行。今后如果仍是这样，不是不对，是不够的。怎么说呢？就是别人标准提高了，我只有这一些，那是非被淘汰不可呀！诸君！如问今后做人标准怎样呢？请读我附去的两封信，我读了这两封信，不知滴了多少眼泪！

诸君！这两封信，是小河镇上两位在前方打仗的小英雄写给他的父母的呀！这两位都还是小河镇上小学学校里未毕业的学生呀！他们都已知道国家的意义和国民的义务，不但知道，并且都肯去实行。他们对于抗战，认识得这样清楚，肯把生命交给国家。你们想：现时有等人，还是自私自利，还是假公济私，甚致营私舞弊，这种人的品格，还能和他们相比吗？他们并且对父母这样孝顺——你们必须要明白，这才是做人的最高标准。因为爱国家和爱父母，同是至高无上的爱。古人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简直是忠孝两全，就是会理县的模范青年，也就是全国全世界的模范青年。我们已经预备把他们的信摄影分送各地，来一个广大的宣传。诸位，你们都是会理的青年，是多么荣耀呀！也许会想到我还没有这样做，不免有些抱欠。抱欠是不必，只须我们大家努力去做。

怎样做法呢？我们硬要把垂危的中国挽救回过来，硬要

把他复兴起来，会理的青年，至少须把会理整理起来，繁荣起来。把会理的民众，唤醒起来，把他们的痛苦，救济起来。男女青年，每人至少要学一种本领，要尽一部份的义务。怎样学法？怎样尽法？我讲演和谈话中间，提出具体的办法，已着实不少了。请诸君回头去想。

诸位！会理的现代青年，难道只是张镒、李永安^③两人么！不，还有诸位。

诸位！我最爱的会理，最爱的会理青年暂别了。我从内心献一个最诚恳的敬礼！

附信两封。（略）

二十八·六·六·黄炎培 攀莲街

注：①郝陵即郝经，元泽州陵川人，故号陵川。著有《续后汉书》、《陵川集》等。

③黄以会理中学为西康省立，故称省中。

②张镒、李永安就是写那两封信的抗日军人，是小河小学尚未毕业的学生。当时农村小学大龄学生较多，小学生中有超过二十岁的。